

# 提升生产率:新常态下经济转型升级的目标与关键措施

刘志彪

(南京大学 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江苏 南京 210093)

**[摘要]**主导国家发展命运的决定性因素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因此提高生产率才是政府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的政策目标和依据。无论是空间上的“腾笼换鸟”,还是加大研发投入比例,或者调整产业结构,都不能成为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的标志和政策导向。当前我国经济面临持续的下行压力,本质上是因为生产率的持续下降与要素成本上升的共同作用。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措施,是要启动国家层面的、新一轮大规模的技术改造。这是新常态下经济增长动力重塑的利器,是产业升级的一把金钥匙,也是一种比较容易操作的、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办法。

**[关键词]**产业转型升级;腾笼换鸟;提升生产率;技术改造;经济发展新常态;产业政策;经济转型升级

**[中图分类号]**F2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833(2015)04-0077-08

保持经济发展中高速增长和迈向中高端水平的“双目标”,是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中国政府对经济提质增效升级的总体要求。经济中高速增长,既是为了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相衔接,也是为了与经济总量扩大和结构升级的要求相适应;经济迈向中高端水平,关键是要努力攀升产业价值链,提高要素生产率。具体途径很多,如增加研发投入,提高技术进步速度,加强质量、标准和品牌建设,促进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比重提高、水平提升,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加快培育新的增长点和增长极,等等。达到上述“双目标”的最佳状态是,国家能够实现在发展中升级、在升级中发展。

只有经济转型升级上述“双目标”才能实现。经济发展体制机制的转型,为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提供新的动力。产业在价值链上的升级,体现为经济发展迈向中高端水平。由此可见,经济转型升级与“双目标”的一致性。然而,虽然转型升级一直是一个官方、学界和新闻界使用的高频词汇<sup>[1]</sup>,但是我发现其实很少有人去认真研究过它的真实内涵,尤其是没有人细致地琢磨过它的政策标准和达到目标的主要战略措施。

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大问题。因为在实践中,转型升级这个战略内涵已经是一个非常混乱的概念,事实上早已成了一句时尚尊贵的“帽子”。这自然导致促进转型升级的政策标准和边界的模糊,使推进转型升级的实际行动被虚置,甚至走向歪路。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我国正面临着增长速度下降、增长动力重塑、经济结构重调、经济风险防控等艰巨任务,如果转型升级工作不力,极有可能使我国发展陷入“中等收入”陷阱<sup>[2]</sup>。由此可知,对转型升级问题的分析思考,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政策意义。

为此,本文挑选出几个在实践中急需解决的问题进行学术上的理论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我们的战略对策建议。这几个问题的选择,完全是出于我个人的认识和思考偏好,并不意味着其他问题不重要。

**[收稿日期]**2014-03-19

**[作者简介]**刘志彪(1959—),男,江苏丹阳人,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中心教授,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国经济和产业经济研究。

## 一、“腾笼换鸟”:可能并不是转型升级的最佳空间战略

“腾笼换鸟”曾经是我国东部地区的一种流行的产业转型升级战略,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把现有传统的制造业“转移出去”,再把先进生产力“转移进来”,以达到经济转型升级目的的一种战略举措。

这样理想化的战略与政策,好处可能是提升了转出地的产业层次,提高了其单位国土面积的投资强度,更高价值地利用了珍贵的土地等要素资源。“腾笼换鸟”的策略显示了政府产业结构调整的决心。但是从广东、江苏等地的经验看,它可能直接产生两个重要的问题:一是短期内产业转移过快会对当地的经济、外贸、税收和就业形成较大冲击;二是它可能会存在“鸟飞走了,笼子还空着”的情况,而且企业竞争力是动态变化的,新入驻的企业效益也会下降,另外腾笼换鸟并不能周而复始。“腾笼换鸟”作为很多地区产业升级的基本战略措施,其影响和危害很大。

第一,“腾笼换鸟”政策很可能人为地撕裂宛如“生物链”那样呈集聚状态的产业链。如在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大中小企业之间已存在的完整配套的产业链,在企业结构中往往有些企业做重型机器设备,有些企业做配套的螺丝。如果我们把做设备(赚钱多)的留着,而把做螺丝(赚钱少)的迁走,就等于把这个完整的产业价值链给撕裂了,也毁灭了该产业存在的基础。

第二,“腾笼换鸟”需要政府花费巨额的迁移企业成本。一方面,在“腾笼换鸟”的过程中,对早期廉价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入住企业,现在要它搬走,地方政府必须支付巨额土地涨价后的费用。而且,这些需要搬迁的厂房,绝大多数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及中国加入WTO后建设的,政府对这些厂房推倒重建或改建,将是一个极其严重的浪费。另一方面,迁入地为了竞相吸引这些转移出来的企业,也要付出巨大代价,如代付迁移费、免费建设厂房、极度优惠的税收甚至倒贴、代招工,等等。其实,在实践中,往往也不会有那么多的高新产业进来使用这些旧厂房。就算有,这些厂房一般也不符合那些高新产业的要求。

第三,从全国范围来说,简单的“腾笼换鸟”并不有利于解决生态文明的问题。众所周知,产业的转移可能带来污染的转移。“腾笼换鸟”会将一些高污染的工业转移到相对落后的欠发达地区。这样,这些地方又会像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一样,再被污染一遍,然后再花钱来治污。

第四,中国的产业集聚在沿海地区,主要原因在于,这些产业大多是出口导向型的,发挥的是国际贸易的地理效应,即交通运输成本的优势以及交易成本的相对低廉优势。如果这些产业被大幅度地转移到内陆地区,由于其高昂的运输成本和交易成本,产品必然缺乏竞争力,而其仅仅依靠地方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来扶持,肯定难以持久。很多中西部地区是靠高额的政府补贴吸引沿海地区落后的转移产业。

第五,现在沿海地区的一些传统企业,面临前所未有的要素价格上涨趋势,尤其是劳动成本增加和利率水平不断攀升。经济危机又使传统企业面临市场萎缩、订单下降、产能相对过剩等诸多问题。这种情况下,挽救企业的最佳方式,是通过降低土地、厂房租金、减税让利、提供金融支援等手段,而不是运用“腾笼换鸟”的发展思路要它们远距离“转移”和迁徙。这只会加速企业的死亡。

过去我们以迁移或者转移方式空出了“鸟笼”,但引不来“新鸟”,即使引来了,不仅成本巨大,而且“新鸟”因为企业的产业链和生态环境缺乏,当其直接面对发达国家残酷竞争时,也难以活下去。本文后续将会论述,从转型升级的真实内涵来看,强调“腾笼换鸟”,不如强调通过技术改造,实现产业就地升级。

当今流行的国家竞争理论,如迈克尔·波特的“钻石模型”,就是在产业本地化升级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sup>[3]</sup>。波特教授十分强调本地企业在产业集群升级中,那些来自环绕于产业链四个因素的共同作用,即:(1)生产要素供应(包括人力资源、天然资源、知识资源、资本资源、基础设施等),(2)需求条件(主要是本国市场的需求),(3)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即与这些产业相关的上下游产业是否有竞

争力), (4)企业的战略、结构、竞争对手的表现。除这四大要素之外,还存在两大变数:政府与机会。其中,机会是无法控制的,政府政策的影响是不可漠视的。由此看来,波特的产业升级模型,并不是强调企业遇到成本上升时,就要进行产业空间转移,而是要从决定产业升级的共同因素入手,设法围绕产业链创新价值链。但是由于这个理论的缺陷,在实践中我们不容易根据它找到决定产业升级的主要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另外,全球开放型经济理论的研究,也对我们转型升级的空间战略和政策取向具有许多新的启示价值。例如全球价值链(GVC)理论十分重视GVC与产业集群的交互演化作用<sup>[4]</sup>。这种纵向与横向之间交互关系的产业升级效应,表现为全球化分工中的本地化升级,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向上:一是全球价值链的治理结构如何提升产业集群的水平;二是本地产业集群中的企业如何通过相互学习、模仿和创新,以促进其攀升全球价值链的地位。

过去我国理论界对产业集群升级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上述波特的竞争力本地化来源方面,即从“集体效率”分析集群内的纵向和横向联系<sup>[5]</sup>。这些研究经常会忽视日益重要的与全球经济相关的外部联系。由于全球化导致生产体系、流通渠道、金融市场的变化以及互联网技术的扩散,企业的产业集群日益一体化使得企业切入到横跨许多不同国家运作的全球价值链中,它们从价值链的全球买者那儿学到了许多过去无法学到的全球运作知识和技能,得到了进入全球市场的机会。而且,全球价值链的内部治理也对本地企业的升级有重要的影响。如即使是在“被俘获”的价值链中进行国际代工,处于价值链高端的治理者也会让代工者得到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的可能性和机会<sup>[6]</sup>。集群和价值链这两种组织生产的模式,为本地企业的升级和现代化,提供了有利的机会。随着全球分工格局和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全球价值链已经转向全球创新链,为此需要我们把致力于产业转型升级的注意力更多地转向与世界的外部联系,即我们要善于在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中,利用全球智慧和知识,为发展我国的创新经济服务。由此看到,那种成本高了,就让企业转移出去的所谓“腾笼换鸟”的产业转型升级模式和战略,其实并不适合、也不应该成为大多数具有技术创新空间和潜力的产业。

## 二、提升生产率:新常态下转型升级的政策目标

当前我国的转型升级工作中出现了许多的窘境和偏向,主要原因之一是指导转型升级的理论出现了失误和偏向。除了上述的在空间上的“腾笼换鸟”理论偏误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把转型升级理解为提高R&D占GDP比重,认为这样就加快了技术进步,就进入了以创新为主导的经济发展轨道。其实,研究开发投入比例的提高,离实际的科技产出还有很长的路。很多的研究开发活动还只属于创造知识的范畴阶段,并不是真正进入了创造财富的阶段,因此以这个指标反映转型升级,理论依据并不充分。而且,它对于实践可能也有巨大的危害:由于它本身并不考虑研发投入的效果,因此以此指标考核地方和部门的转型升级绩效时,就容易驱使它们不计效果地进行浪费性投入,甚至不断地、大规模地为这个指标造假。如把某些不属于研究开发的支出列入考核内容,某些地区要求那些只具有“世界工厂”性质的外资制造加工企业也要设立研发中心,结果这演变成了套取政府科研投入经费的一个途径。

二是把转型升级理解为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挑选“输家”和“赢家”的游戏,体现为政府的“上什么产业,下什么产业”的企图。按此标准,转型升级就是要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鼓励企业发展高端产品,限制传统产业和传统商品。其实产业并没有高低贵贱,只有有没有创新、有没有附加值高低之分<sup>[7]</sup>。传统产业一样具有竞争力,而新兴产业缺乏竞争力可能死得更快。因此这一政策标准在实践中具有巨大的危害:(1)它使我们主动轻易地放弃了几十年来好不容易在全球化中获得的在传统产业的竞争优势;(2)它使我们作为后发展中国家,快速地、直接地面对发达国家的面对面竞争,遭遇来自这些国家前所未有的打压,如以新能源、新材料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遭遇;(3)它使

我们可能丢失全球 40 多亿人口的巨大市场,从而转向为全球少数高收入人口服务的狭窄市场。这将是巨大的失策。

三是把转型升级理解为从制造业转向为现代服务业,认为服务业占比高,就是转型升级;制造业占比高,就是转型升级不力。固然,现代经济发展体现为制造业为主转向为现代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也会推动产业结构的演变,但是,这个结论反过来并不成立,我们绝对不能反过来以服务业占比来衡量转型升级的程度。其一,从宏观经济看,产业结构中制造业占比高还是服务业占比高,是由经济发展水平和阶段决定的,是由人均收入水平高低决定的,是客观的不能人为推进和改变的。其二,从微观经济看,企业选择什么产业,取决于它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人为地推进它们都进入服务业,显然是不符合基本的经济理性。其三,从地区经济活动看,我国人均收入较高、经济发展领先的地区其服务业比重反而较低。其实,服务业比重的演变规律,并不适用、也不能用于指导一个经济体并不完整的、缺少相对独立性的非大都市经济区的结构调整,尤其不适合用来指导一个省内某些行政区域的结构调整。我国经济发达地区服务业比重长期难以较大幅度上升的原因,除了受收入水平等因素影响外,还主要与其深度地参与全球产品内分工的特性有关,也即大量承接国际制造业外包使全球制造业市场成为支持这些地区制造业比重持续上升的因素<sup>[8]</sup>。其四,实践证明,用服务业占比这个指标去衡量转型升级水平,容易人为地导致“制造业空心化”和制造业早衰现象,并引发大规模的“经济泡沫化”。

四是把转型升级理解为“增量调结构”,轻视“存量调结构”,即采取加大投资手段大力发展新兴产业,期望以“增量带动和稀释存量”,对产业结构进行优化调整。这不适合我国经济发达地区经济总量大,尤其是实体经济比重大、技术改造迫切性强的客观情况。当前宏观层面存在库存压力大、产能过剩等问题,也决定了今后一个阶段以“增量调结构”的方式实施转型升级的政策空间不大。立足“盘活存量”的政策思路,通过改善企业经营环境,将要素集中到优势企业,同时通过资产证券化等方式,使存量资产流动起来,并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这将是我国发达地区产业结构调整 and 转型升级的主要途径和方式。

由此可见,转型升级战略的正确性,并不能保证其实现路径和机制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不符合国情的、科学合理的实现路径和机制作为保障,那么转型升级战略就是一句空话,有时甚至有害。

从发展上看,主导国家发展命运的决定性因素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因此,“提高生产率”才是政府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的政策标准和依据。它的提出理由大概可以归纳以下几点。

第一,我们实施转型升级工程,无论发展什么产业,根本上是要提升企业竞争力,实现生态文明。企业采取提高员工素质、研发新技术、更新设备、加强管理、构建渠道、培育品牌等策略,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通过提高生产率的方式,增强企业的盈利和效益。

第二,提升生产率是实现“稳增长”的重要保障。企业生产率慢于劳动力工资、资金价格上涨,是企业经营效益下降、投资意愿减落的主要原因,在宏观上就表现为经济增速下降、财政增收困难等。归根结底,企业生产率的不断提高,才是经济增长经久不衰的可持续源泉。

第三,只有生产率的提升,才能使城乡居民收入提高进入良性轨道。“惠民生”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城乡居民收入稳步提升,工资作为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其增长的可持续性在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能否与之保持同步和适应,如果不能则“收入倍增”等规划就是无源之水、空中楼阁。

因此,面对当前生产要素成本的不断迅速上升,转型升级的真正含义和由此决定的最佳策略,就是要让传统产业提升生产率,通过生产率上升克服成本上升因素,并通过更低成本和价格刺激市场扩大。

另外,如果我们以“提高生产率”作为推进转型升级的政策标准,来看转型升级中的“腾笼换鸟”问题,显然这个时候的“腾笼换鸟”,就不是简单化地搬迁企业,或者把企业赶走挤跑,而是指要为企生产率的上升腾出空间,原有产业和企业要通过“凤凰涅槃”,重新生产出生产率更高的,经过新技

术、新模式、新管理改造过的新产业体系。因此强调“腾笼换鸟”，不如强调通过技术改造，实现产业就地升级。

为加快推进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提升生产率需要以市场为基础，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政府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 补基础设施短板，为生产率提升创造外部经济。中国前一轮积极财政政策，多投向高铁、港口和机场等“铁公基”项目，但城市之间的基础设施仍比较薄弱，即使是发达地区的沿海，铁路网络的建设任务也很繁重。另外，城市内部基础设施，如地铁、城市地下管道和污水处理、城市棚改等仍比较欠缺，投资空间很大。这些投资将产生很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2. 可以考虑将“提升生产率”作为我国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的指导原则。政府不搞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拉郎配”，不搞国有控股还是民营控股的“僵化红线”，而是看两者结合能否提升生产率。一是政府将具备条件的国有企业实现整体上市和资产证券化，提升国有资本整体效率；二是政府利用民营上市公司的价值发现功能，让其重组竞争性国有资产；三是国有企业控股尤其是股权比例高的上市公司，通过向民营企业定向增发的方式，引入民营战略投资者，实现两者互补。

3. 以市场化手段引导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投资，发挥投资在提升企业生产率中的关键作用。投资与创新不矛盾，创新型经济的发展、技术改造、两化融合等都需要大量投资。政府应该发挥引导和分担风险的作用，突出企业创新的内生激励，研究对各类创新项目的最优支持方式，重视对补贴项目的跟踪评估，注重对项目应用性的开拓。

4. 建设研发的公共服务平台和实验室。服务于区域创新的公共服务平台，是促进该产业集聚的重要原因。但是诸如光电、生物医药、新材料等行业的公共创新平台建设，需要巨大的投入，而多数这类企业独立建设既不经济，也难以承受。为此政府可以在区域研发公共平台和实验室建设上发挥更大的作用。政府要结合区域产业基础和产业规划，支持、鼓励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之间合作。

5. 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过程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步骤，就是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把现阶段的“合格制造”变成“优质制造”、“精品制造”。从提升劳动力实用技能出发，我们要积极抓住中央当前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机遇，发挥各层次教育力量的优势，将我国建成像德国一样的职业教育大国和强国。

### 三、大规模技术改造：促进转型升级的关键措施

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提质增效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如何在防止经济减速过快的同时，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以增强国际竞争力。当前实体产业发展虚弱乏力，利润单薄。究其原因，除了虚拟经济“虚火”过旺外，根本在于我国产业的生产率低下，不能够消化或抵消掉要素成本上升的压力。解决这个问题，最终企业必须通过技术进步提高生产率来实现。而启动国家层面的、新一轮大规模的技术改造，是推动新常态下经济增长动力重塑的利器，是推进产业升级的一把金钥匙，是一种比较容易操作的、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方法。

1999年，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我国曾经启动了对国企的三轮大规模技术改造。首批159个技改项目主要涉及冶金、纺织、有色金属等8个重点行业。当时中国有80%的国有大中型企业需要改造，这为外资和先进技术进入中国开辟了新的领域。具体办法是，国家在增发的600亿元国债中，拿出90亿元用于支援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的技改项目贴息。这些财政贴息拉动了相关技术改造投入1800亿元，有效地应对了当时的金融危机，满足了那个时期稳投资、调结构、促发展的需要。

目前中国经济运行中的一系列问题，主要表现为“增长失速、结构失衡、动力失能、债务失度、机制失灵”等方面。其中，最主要的问题为增长动力失去和结构失衡。解决这些问题当然需要各种政策措施共同发力，但是选择启动新一轮大规模技术改造来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既可以改善宏观经济面有立竿见影的中短期拉动作用，又有促进生产率大幅度上升、提升发展质量的长期效能。它的主要

原因有以下几个。

1. 大规模技术改造能够在经济周期的低谷阶段迅速有效地稳定增长。在经济周期的低谷阶段进行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更新改造,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揭示的反经济周期的基本原理。在实践上,如果我国能分3年左右时间推动50%以上的制造业企业完成新一轮技术改造,并保持工业技术改造投资年均增长20%~30%左右,那么就不仅能消除低质量、高消耗的工业品供给,而且能够使不断回落的全国固定资产投资速度不断拉起。

2. 大规模技术改造能够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有效地调整产业结构。我们要充分发挥技术改造的“四两拨千斤”作用,把新一轮技术改造的方向明确集中在智能制造、“两化”深度融合、技术设备更新和绿色低碳环保等几个主要方向,将更多资金投入到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集中资源、资金、政策去扶植这些领域中的成长性优质企业。

3. 大规模技术改造能够加快工业化与信息化的深度融合,追赶当今工业革命的新潮流和新方向。我国规模巨大的“中国制造”迫切需要转型升级为“中国创造”,这对利用信息化进行产业改造提出了内在强烈的需求,也为信息产业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市场需求。当前,发达国家把制造业互联网化作为工业化和信息化两化融合的前沿和重点,这是工业革命4.0主要方向。如果我国的新一轮大规模技术改造瞄准这个方向,就可以有效地抓住新一轮产业革命的重大机遇。

4. 大规模技术改造能够为我国参与新一轮的国际竞争预先强身固体,储备有效技术并清除无效产能。目前,我国一些传统行业生产能力过剩,但是高技术含量的产品仍然大量进口。如果我们能够通过新一轮大规模的技术改造顺势淘汰一批落后技术和产能,就不仅能极大地提升制造业生产率,而且在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劳动力紧缺的前提下,等于加快了“机器换人”的步伐,可以为我国参与新一轮国际市场竞争奠定良好的基础。

5. 大规模技术改造能够有效地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确保安全生产。制造业特别是重化工业不是污染的代名词。德国、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也是世界化工强国,但是人家仍然是碧海蓝天,这主要是因为环保标准高而且执法严格,工业的技术设备工艺先进。我国作为重化工大国(但不是重化工强国)不仅有迫切需要解决的严重污染问题,而且还有许多严重的安全生产隐患问题。因此,政府大规模推动企业按照最严格的环保标准进行技改,不仅能够节能降耗,为严厉的环保执法奠定技术基础,而且还有助于消除因设备老化而出现的安全生产隐患,从根本上缓解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安全生产之间的矛盾。

现在国内一些发达省份纷纷都在抓技术改造的新机会,如果政府从国家层面再出台一些有力度的政策,那么效果会更好。据我们调查,江苏正在以推进“智慧江苏”建设为目标改造国民经济。如所推进的“两化融合”战略以工业领域信息化应用为主攻方向,创建了3个国家级两化深度融合试验区、43家省级两化融合示范区和14家信息服务产业园区,开通了省级工业云平台和中小企业“e企云”平台。江苏在交通、国土、教育、卫生、金融等领域形成了一批重大示范试点项目<sup>[9]</sup>。

山东针对经济结构中重化工和原材料产业比重大、产业价值链较短、科技支撑能力不强等问题,仅2014年就投资2228亿元,帮助企业进行重点技术改造。这些年大批企业在起点不高的情况下,靠技术改造积累实力,逐渐走上了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培育出了像万华集团、东岳集团、西王集团、丛林集团等一批在国内同行业领先的企业。

另外,我们也应该客观地看到,江苏、浙江、山东等都是我国重化工大省,它们在过去一些年中大量投入使用的重化工设备存在着技术更新的迫切要求,目前不仅存在着严重污染环境的难题,而且越面临着严重的安全生产形势。

最近,广东计划在2015—2017年,累计完成工业技术改造投资9000亿元以上。广东鼓励发展智能制造产业基地,计划重点建设广州、深圳、东莞、揭阳、佛山、顺德等智能产业聚集基地,争取新创建1个至2个国家级智能制造试点。广东引进国外著名机器人公司及国内外高端智能制造企业,培育

发展 100 家左右智能装备整机和关键零部件研发制造骨干企业。

2014 年 9 月,李克强总理在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部署了完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以促进企业技术改造、支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这对于推动用先进技术和装备武装中国制造、推出附加值更高、市场竞争力更强的产品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它是一种延缓税收激励企业技改的单项行动。在现在这种特殊的经济形势下,单靠加速折旧一项措施,不足以抵御越来越严峻的增长失去动力的问题,更不能完成产业升级、“机器换人”等艰巨任务。

为此本文建议中央应尽快在全国范围内启动我国企业的大规模技术改造活动,并对这项活动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政策扶持。

1. 信贷政策支持。本文建议把央行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放出来的信贷增量作为启动我国企业大规模技术改造活动的主流资金。2015 年 2 月 4 日中央银行首次降低准备金率大约释放 7000 亿元的信贷资金。如果央行连续降低 3 次至 4 次存款准备金率,配合 2015 年可能的多次降低利率的行动,由此得到的较低成本的新增信贷资金,将可以对全国性的大规模技术改造产生足够的金融支持。

2. 资本市场支持。政府对那类计划用募集来的资金,优先或主要投入技术设备改造的 IPO 企业,可以给予优先上市的资格,以体现政策支持技术改造,也可以对计划用定向增发的资金投向技术改造的上市公司,在排队序列中优先批准,还可以对承诺并购后首先改造企业技术设备的企业放松并购限制。

3. 财政政策支持。政府通过技术改造专项资金、事后奖励补助政策、股权投资、贴息等方式支持高端的、有规模效应的、龙头集聚效应的技术改造项目,发挥财政贴息的杠杆效应。另外,政府就是要把对生产者的供给方补贴适当地改为对消费者的补贴,即对使用技术改造后产品的用户进行一定的财政补贴。这样既可以为技术改造企业创造市场,也可以有效地防止寻租性腐败。

4. 用地保障。技术改造的用地原则,是要能够提高单位国土面积的投资强度,更高价值地利用了珍贵的土地等要素资源。因此对技术水平高、单位国土面积投资强度高、环保保护水平高的原地改造企业,政府原则上都应该保障基本的和适度扩张的用地需求,或者优先搬迁到条件较好的工业集中区安置。

5. 人才支撑。作为政府对企业技术改造的支持,在人才政策方面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对符合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方向的重要技术改造骨干人才,在企业引进时政府可以对其进行一定的收入、福利和科研补贴;二是为这些符合预先设定标准的高级人才,提供家庭生活的便利,如住宅、家属就业、孩子入学等。

6. 科技创新。对企业技改中的技术创新,政府一是要坚决保护其知识产权,严厉打击盗取技术、知识产权的行为;二是要给予适当的经济激励。政府可以考虑增加对技术改造有突出贡献人员的股权激励比例,也可以考虑给技术改造后增加利润的企业,以予适当降低征收增值税比例的优惠。

7. 平台建设。一是政府要在大学、科研院所建设各类对企业开放的实验室,发挥公共资源在推动创新的作用。二是政府依靠市场力量发展实验室经济,积极培育做大研发产业,推进各种科研院所通过改制进入市场,发挥其在创新资源的优势和创新源头的的作用。三是政府要建立健全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改造创新体系,引导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

#### 参考文献:

- [1] 张良娣,李思忆.最新高频词:创新、转型、升级[N].新华日报(A2版),2010-1-25.
- [2] 龚方雄.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劳动生产率[EB/OL]. <http://money.163.com/11/0526/15/7506VDGJ00254MI7.html>, 2011-05-26.
- [3] 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 [4] Roberta R, Carlo P. Upgrading in global value Chains: lessons from latin American clusters [J]. World Development, 2005, 33 (4):549-573.

- [5] Hubert S. Small shoemakers and fordist giants: tale of a supercluster[J]. World Development, 1995, 23(1):9-28.
- [6] Humphrey L, Schmitz H. How does insertion in global value chains affect upgrading industrial clusters[J]. Regional Studies, 2002, 36(9):1017-1027.
- [7] 王保安. 中国经济升级版应如何打造[J]. 求是, 2014(1):21-24.
- [8] 刘志彪. 为什么我国发达地区的服务业比重反而较低? [J]. 南京大学学报, 2011(3):13-19.
- [8] 刘志彪. 东部地区基本现代化的政府推动与制度安排[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14(1):3-10.

[责任编辑:杨志辉]

##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Target and Policy Orientation, Productivity Increases

LIU Zhibiao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Center,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Abstract:** The fate of leading national development decisive factor is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productivity and labor productivity, thus productivity is the government policies which can be used to promot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e the standard and basis. Whether the 'making room of cage for a new bird' in the history of space, or increasing the proportion of R&D, or adjusting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it will become a symbol for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Continuing downward pressure on the economy faces China, essentially it is because productivity declining trend will not be able to offset the rising cost of elements. Starting at the national level, a new round of large-scale technical transformation is to promote economic growth under the new normal state is a golden key to promoting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it is also a kind of easy operation, an effective way proved by practice.

**Key Words:**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making room of cage for a new bird; productivity improvement; technology transformation; new stat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dustry government; economic transition upgrading